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Ontology of The Dadao Philosophy
The Ontology of Morality:
A Study of Metaphysics of Morality and The Spiritual World

大道哲学通书

第五卷

道德本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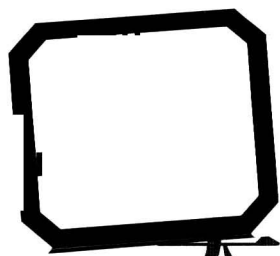
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

司马云杰 著

- 一部为道德精神世界重建提供哲学本体论的著作
- 一部重建中国道德精神世界的著作
- 一部重建中国现代秩序的著作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大道哲学通书

第五卷

道德本体论

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

司马云杰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道哲学通书. 第5卷,道德本体论/司马云杰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080-6829-9

I. ①大… II. ①司… III. ①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7950 号

大道哲学通书·第5卷

道德本体论

司马云杰 著

策 划: 陈小兰

责任编辑: 马 颖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4月北京第1版 201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开

印 张: 32.5

字 数: 564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59.80元

本版图书凡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大道哲学通书》序言

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宇宙万物本原的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天地万物化育法则所提升出来的形上之道，亦即万物生化的宇宙原理。故曰：“大哉圣入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故大道即形而上学之道，即哲学本体论之道，即天地之道，即“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之道，亦即先王开物成务，“知周乎万物而不遗”之道。大道哲学即此大道本体论哲学也。

形上大道本体，虽然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然其发用流行，则可见诸鸢飞鱼跃、风动蛇行。其乌黑鹄白，雄鸣雌应，阳抱阴合，万物化生，无处不是此道流行！故老子讲：“大道汜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因此，中国文化的“道”或大道本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存在，并不是空悬着的，不是置于彼岸世界的，而是可周流宇宙、贯通万物，向下落实为万物生化及文化历史领域各种存在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存在。《大道哲学通书》，即贯通大道本体论之书也。

世界各族人民之文化精神，皆是以其形而上学最高本体存在为根据的。正如西方文化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逻格斯”与上帝的存在，印度文化精神从来没离开过“梵”的存在，中国文化，从古至今，几千年来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形上之“道”的存在，没离开过大道哲学本体论的存在。三皇五帝，历代圣贤明哲，行王道，回造化，图善治，开文明，无不是贯通“道”的精神，贯通大道哲学精神，无不以形上之“道”的大法则、大哲理而功德于天下。《大道哲学通书》，亦即贯通中国文化几千年根本精神之书也。

以大道本体贯通一切、旁通一切而为书，就是《大道哲学通书》。它包括《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五卷著作。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乃是从最高本体论对社会历史、伦理道德、心性精神所作的文化哲学阐释，亦是从大道哲学出发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归复与还原。五卷“通书”依其内在逻辑，首卷《大道运行论》研究了中国文化哲学的最高本体论与根本精神；紧接第二卷《绵延论》研究了这

2 道德本体论

种精神的绵延之理；尔后第三卷《盛衰论》将大道本体论贯通于社会历史领域，研究了中国历史哲学及盛衰治乱之理；继之第四卷《心性灵明论》，将大道本体贯通于人心人性，研究了心性本体与人文精神创造；最后第五卷《道德本体论》则将大道本体贯通伦理道德领域，研究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的研究内容及先后次第如下：

第一卷 大道运行论

——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

第二卷 绵延论

——关于中国文化绵延之理的研究

第三卷 盛衰论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第四卷 心性灵明论

——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第五卷 道德本体论

——关于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

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全部贯通大道本体，贯通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其为道也，周行不殆，独立不改，浩浩大化，绵延赓续，构成一种宇宙生命精神，一种中国文化绝对精神与民族魂的存在；其为书也，以大道为最高本体论存在，贯通一切、旁通一切，构成一个完整的哲学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2003年出版《大道哲学全书》时，曾把《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放入其中，现在考虑到此三本书皆是由现象界提升到形上界，由经验研究提升到本体论高度的，并不是自始至终皆贯通大道本体论的，故这次出版《大道哲学通书》并没有纳入其中，而是恢复其《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形式另行出版。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皆是以大道本体论贯通一切、旁通一切的著作，属于纯粹大道哲学的著作。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本于天的民族。天，在无限时空意义上，就是宇宙。以天为本，就是以天道法则、宇宙法则为生命精神之源头！远在7000年前的伏羲时代，中华民族就仰观象于天，俯察理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开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现在保留在连云港将军崖石坡祭祀烟黑的两块巨石旁，右边所刻银河、太阳、星辰岩画，就是一幅伏羲时

代东夷氏族部落所留下来的最为古老的祭天图^①。中国文化是早熟的。当世界其他民族尚还处于野蛮蒙昧阶段时，中华民族对天道的思考，对宇宙法则秩序的思考，发展到 4300 多年前的唐虞时代，不仅讲“天叙有典”、“天秩有礼”，从宇宙法则秩序中获得了真理、正义、和平、伦理、道德、自然法与国家观念，而且哲学思考已经达到“惟精惟一”的高度。这使中华民族发展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思考方式，即看待宇宙万物的存在，不是对着感官材料思考问题，而是提神太虚，站在“寥天一”的高处，俯瞰宇宙万物，透视其生生化化的奥秘，把它提高升腾为一个最高存在，然后去此去彼、去杂去芜，去掉一切具体时间、空间的存在，去尧之誉与桀之毁，去掉一切世俗价值判断，去掉从不同视野看问题所获得的各种观点、观念、偏见、偏执，“参万岁而一纯成，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看那个最高存在，那个最纯粹的存在是什么？然后再将其往下贯通落实，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可以成天下之文；极其数，可以定天下之象，就像中医根据阴阳五行的变化可以开出无限的处方一样。这与西方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紧紧盯着原子，或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将原子分成质子、中子、电子、光子等等是非常不一样的。一直往下分，虽然可以把事物精细化，但它有一个局限，就是不能从根本上说明事物本质及其终极存在，因为“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是无法穷尽的。

大道哲学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明哲以提神太虚、高瞻远瞩的思维方式所发展起来的纯正本体论哲学。它乃是物物而不物于物又穷尽万物，忘乎物、忘乎天而又入乎天，明白天地之德而为大本大宗，推天理，通万物而为之的大法则、大哲理。其为道也，乃是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兼三才而两之”的广大悉备之道；其为学也，乃是万物一理之学，或万物一体之学。以大道本体存在而为学，达穷神知化，为之最高知识；得之谓德，为之最高道德；至精至神，为之最高精神。它体用同源，显微无间，先天后天、形上形下，浑然一体，毫无分割，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是完全统一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为一体，而不是割裂为条条块块，支离为相互隔

① 将军崖在祭祀烟黑的两块巨石旁，刻磨有一条长长的银河，银河内有无数星云符号，银河右边更刻有太阳、星星符号。此即当时人所理解的天或宇宙也。这与烟黑的巨石联系起来看，显然是当时人祭天所绘制的天象图。在登上将军崖的立坡上，所刻众多人头像，皆包扎网状饰物。此乃伏羲因结网而渔。所发明之“都布”，即土布也。由上可以断定，将军崖所刻银河、太阳、星星符号，实乃伏羲时代东夷氏族部落祭祀活动所遗留下来的最古老的祭天图。

4 道德本体论

绝为孤零零的知识或知识片段的。而今在实证哲学思潮的支配下，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先验实证，变成了先搞一个理论假设，然后去找材料证明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把万物一体之学的知识体系变成了“碎片化”存在，而且除了从感官材料所获得的具体知识，除了一些情感、情绪、欲望、目的一类心理学存在，再也不能上升到最高形上本体存在，再也不能提升为最高精神。现在的实证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高能物理学、实验心理学等，从本质上说，是在封闭环境下经过实验获得有限知识研究。这种研究，虽然可以把封闭环境所获得的知识做得天衣无缝，但一旦环境开放，把实验对象放到开放的环境下，放到广大悉备的条件下，它所获得的知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也就值得怀疑了。知识不能穷神知化，道德不能达于天德，精神不能至精至神，体用不能一源，显微不能无间，先天后天、形上形下完全分割，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之间相互对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各说各话，把天地万物一体之学或万物一理之学割裂为条条块块，将整个知识体系支离为相互隔绝的知识片段或碎片化的知识，不仅造成了人类精神的塌陷，也撕裂浑然一体的社会历史存在。现在生态危机、环境危机、能源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以及精神危机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哲学危机，都是实证哲学浅薄知识论所造成的危机。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首先就是为从学术上补实证哲学之短，及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而研究写作的。

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夺。”人也好，国家民族也好，养其大则大，养其小则小。惟有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才能广其居、正其位、行于大道，才能贯通天道性命之理，于天地之间立定脚跟不动摇而成为伟大生命。此即《易传》所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者也；亦所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者也。大道哲学者，大人之学也。人生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国家民族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就在于与形而上学、与本体论、与宇宙大法则割断了联系。中国有十几亿人口，国家民族之治及其现代化建设，岂能抛开中国文化的大法则、大哲理，只追求小知小识，或者像后现代主义那样摧毁、解构、否定、抛弃现代理论的庞大体系、客观基础、一致性、因果性等，只是追求多样性、多元性、内在性、不确定性，追求一种相对主义的新体验，一种漂泊不定的新感受，或玩弄一些知识的碎片？墨子说讲“天下所以乱者，则是天下士君子，皆明于小而不明于大”；《大戴礼记》讲“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大成，顾小物而不知大论”，就会使国家之治流于荒诞。惟知大法则、大哲理，方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停留于枝枝节节上，其治不能够广其居，正其位，行于大道，流

于荒诞就在所难免了。形上之“道”或大道本体，乃宇宙法则秩序之纯粹至正之思维形式也。得大道者，得宇宙之大法则也。得此大法则，刚中而庸，大亨以正，才能广居正位，行于大道，成为伟大生命；而其为治也，才能“天德行王道，至诚回造化；道大有善治，浑厚开文明”；“心一明足以开万世，道一大神功格皇天”。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就是为重建国家民族的伟大生命，为国家民族现代化提供大法则、大哲理，经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而撰写的。

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却没有至圣神那样。”大道哲学精神，乃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是中国文化最高精神与民族魂的存在。但是，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在疑古思潮遮蔽下，经过长期而持续的批判运动，人们对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根本精神的存在，已经忘却，造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忘却，这种集体无意识，不仅拆了庙，而且毁了神，毁灭了整个华夏民族精神，造成了天理良知的丧失与人生的昏昧，因而情欲流荡、物欲肆虐，使整个社会人生陷入了疯狂、偏颇与乖戾。治国平天者，不在于税收钱粮多少，不在于修几条路，盖多少房子，而在于唤醒人心、贞正人心。人心正，天下定！中国几千年来治国平天下者，无有不把贞正人心放到第一位的。现在国家民族面临的最大的文化哲学课题，就是重建大道哲学，唤醒人心，贞正人心。清朝李二曲先生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人心。然欲醒人，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研究大道哲学，研究大道本体最高存在，才能使中华民族于宇宙浩浩大化中获得知觉主宰处与性命之理，安身立命。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就是为支撑国家民族精神家园的重建，从天道义理上唤醒人心，使其获得性命之理与安身立命处而研究写作的。

中国现代化及整个政策制定，无非依靠两条：一是不断变化的情况；二是永恒不变的存在。整个外部世界是驰骛不息、变动不居的，因此，总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日日新，又日新，总结新的经验，以便通变化裁，趋时利用。但外部世界不管怎样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总有永恒不变的东西。这永恒不变者，一是人心人性，二是国家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生态环境，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人的道德本性与国家民族的根本文化精神，并没有多少变化，而这恰恰是国家民族文化历史本质规定性所在，是现代化政策制定不可忽视的最为根本的存在。国家民族的现

代化，不仅要有经济基础，更要有文化的精神基础。中国所以不同于西方，阿拉伯世界所以不同于基督教世界，不在于它们的地理分布与自然环境，也不在于它们的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制度，而在于它们文化的形而上学所发展出来的信仰信念与伦理精神之不同。它构成一种社会历史的内在目的论，也构成了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历史存在的精神基础。精神基础不同，社会历史则各有不同本质，而精神是否纯正、美好，最终决定着它们文明样式与程度的高尚低下。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也是为了使国家民族更好地认识自己文化历史存在的精神基础，把握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历史本质而研究写作的。

西方既没有欧洲统一的文化历史，也没有治理大国的历史经验。虽然有一个罗马帝国，但其统治，则一靠宗教（基督教）维持，二靠十字军式的武力征服，别无强大真实可靠的社会历史哲学。欧洲直到 18 世纪，才发展出社会契约。契约就是合同。抛却大纲人伦、政治教化而不顾，物于物而不能与精神世界相通，只靠契约或合同，如何能解决复杂的社会关系，维系国家民族及各种人生？更不要说复杂的现代社会了。而当人类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蒙昧野蛮状态时，在 4300 年前的东方华夏大地，就建立起了一个道德高尚、彝伦攸叙、雍容和谐、高度文明统一的唐虞尧舜帝国。希腊人建立斯巴达国，希伯来人建立犹太国，比这晚了将近 1000 年，而且国家小得多；罗马帝国的出现，则晚了 1800 多年；俄罗斯九世纪才建立国家，欧洲直到今天还没有统一。没有国家民族的统一，就不会有国家民族统一的政治哲学思考，它只能孤立地思考小公国或城邦国的利益。而中国就不同了。唐虞尧舜帝国的建立，不仅为国家民族统一提供了文化历史经验，而且它还建立起一套“惟精惟一，允阙执中”的历史哲学。从此以后，中国历代圣贤明哲无不以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贯通上自伏羲、炎黄、尧舜，下通唐、宋、元、明、清的几千年文化历史，稽古今之变，核盛衰之理，无不以大道哲学说个究竟。因此，五卷《大道哲学通书》的研究与写作，不仅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提供一种大道历史哲学原理，也是为建立盛治理想、国德国运、体统纲纪、礼教文治提供历史经验的。

中国的大道哲学不是狭隘的民族文化哲学，而是天下之学，万物一体之学。它不仅具有天地无不兼覆、无不兼载之道，更具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博大精神。以此大道哲学的普遍原理，明明德，止于至善，不仅可用来修身、齐家、治国，而且以其刚健、中正、仁义之精神，更可以为天下开太平。现在联合国那么多人，那么庞大的机构，所以解

决不了世界各国问题，就在于缺乏大道哲学兼覆兼载之道与博大精神，而中国远在唐虞时代就以此“协和万邦”了。当今之世界，乃是霸道的世界，而不是王道的世界。中国之崛起与复兴，惟有以王道经济代替霸道经济，以中正仁义的价值观代替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方能重新协和万邦，为世界人民所接受；而大道哲学正是可以为此提供普遍原理的文化哲学。

近代以来，西方人抱持一种“欧洲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不仅轻视中国文化，也根本不能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即使他们过去研究中国文化，也只是靠从商人、传教士那里获得的一些道听途说的材料，不仅将中国文化的“经”念歪了，更是依照西方文化观，将其变成了异类存在；现在西方一些所谓汉学家，虽然不乏有见地者，但多数亦是从犄角旮旯搜集一些鄙俗形下材料，作支离破碎猎奇式异类研究的。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很少能从最高本体论上研究中国文化哲学根本精神，也鲜能客观地理解这种精神。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从最高本体论、价值论与知识论上揭示中国文化哲学的独特内涵和逻辑体系，揭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特性与文明的巨大潜在力量，对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在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中显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有着巨大的意义。

现在，不仅中国历史处于盛衰转折点上，而且整个人类近二三百年的物欲恶性膨胀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世界文化历史也到了一个转折点上，处于一个新的转型期：它必须由外在的物质极度扩张转向内在精神发展，由功利之求汹汹于天下，转向一个富于人性的温情社会。中国随着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也正面临着文化转型，面临着一个以诗书礼乐重新教化天下的新时期。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中国要完成新时期以诗书礼乐重新教化天下的任务，要给世界文化历史转变提供新的哲学原理，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亦乃适逢其时也。

然而，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何其难也！过去二三十年，我出书没遇到过困难，常常是一本书没写完，就被出版社把书稿定下了。现在出版体制改革之后，各家出版社出书都加强了成本核算、利润经营。因此，出版五卷《大道哲学通书》费了不少周折！因为该书规模大，成本高，一般出版社是很难接受的。这次，五卷《大道哲学通书》所以能够出版，不仅《道德本体论》一卷得到了华夏英才基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资助，而且整个“通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的资助及华夏出版社的支持。因此，在《大道哲学通书》出版时，我要向上述单位的领导及朋友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也感谢中国社科院老干部局对我这些年科研工作的支持。《大道哲

8 道德本体论

学通书》虽说是以大道本体贯通一切、旁通一切的，然而它也只是大体具备而言之的，并非完备无缺的体系，如自然界生化流转的本体论问题，除第一卷《大道运行论》有所涉及外，现在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展开深入论述。这个缺陷，只有待完成《中国精神通史》之后，将来撰写《大化流行论》时补上了。

我的全部著作，大体可划分为知天命之作与非知天命之作两大部分。知天命之作者，怀着天道命令所写作之书也。它充满道德感与国家民族的使命感；而非知天命之作，虽有激情，有社会人生之思考，则没有这种道德感与使命感。《文艺社会学论稿》、《文化社会学》等，非知天命之作也；五卷《大道哲学通书》，则是知天命之作也。写作此书，无私无欲，忘物、忘我，忘掉一切世俗的存在，提神太虚，于“寥天一”的高处，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那里没有红灯，没有堵车，没有污泥浊水，没有鄙俗、腐败与堕落，有的只是一片皇皇光明的世界，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任我驰骋，可以享受无待的自由与精神的快乐！如果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人类智慧之巅峰光辉耀眼的哲学皇冠，那么，提神太虚，会其玄极，以应无方，则是攀登人类智慧之巅峰，摘取那光辉耀眼哲学皇冠而研究撰写者也。我希望与读者共享这种境界！

司馬云杰

2011年7月9日于天通中苑淡泊居

《道德本体论》自序

道德吃人吗？道德不吃人。道德不但不吃人，还成长人，拯救人。它把小人变成大人，把俗人变为君子，把恶人变为善人，把堕落的人拯救出来，把腐败的人变为神奇的存在者。世界的堕落，终究是人的堕落，人心的堕落，精神世界的堕落。一切犯罪，一切腐败，一切堕落，皆心之不能保，性之不能守，而陷入邪妄者也。天命之性，心之本体，虽纯粹至善，然杂气质而言之，则几微之动，即有善恶。《易》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人生吉凶祸福悔吝，皆出于感物而动，一念善恶之动所构成的逻辑运演。以道德主于心者，不管外部世界怎样利诱，怎样威逼，怎样以色情淫乐乱其心志，总是“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之而志不营，深道以利而心不移，临惧以威而气不卑，平心而固守”。人之生也，所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临大节而不能夺，就在于内心有道德主宰；其处艰难拂乱之时而心不乱，遭白刃颠沛之际，刀架在脖子上，临生死而寂然不动，也在于内心有道德主宰。而若心之感物，不能贞正，不能自持自止，被各种利欲、爱恶、情伪所驱使，相激相荡，陷入非理性而不能止，则吉凶祸福生矣。

庄子说：“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大凡失性命之情者，凡流于浅薄卑贱者，皆嗜欲太深，天机太浅。王船山先生说：“浅薄情伪相感之情，君子所弗取也。”人之生也，诚如陆象山所说：“廓然、昭然、坦然、广居、正位、大道、安宅、正路，是甚次第？大世界不享，却要占个小蹊小径子；大人不做，却要为小儿态”，岂不“可惜！”儒家讲“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道家讲“至人”者，“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其为道德存在者是何等的光辉伟大！人的一生，离开大道至德，离开宇宙本体存在与最高精神，把人解构为物的存在，役于物，蔽于物，使千千之物为细物，千千之人为细人，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君子的笃实、持重、宽厚、宏毅可言？还谈得上什么人生大气象、大气度存在？只是躯壳上起意，只盯着自我那点微小生命存在，讲“此在”，讲主体性，不过是蝼蚁人生而已。以此为人生，其做人也，心胸如何能开阔，思想如何能通透，人生如何能做得大，

2 道德本体论

又如何能活得快活？仅仅追求眼前那点声色物欲，而没有道德精神世界支撑，如何能不腐败，能不堕落？人的一生，惟有心地虚明，大其道德，推见得天地万物之理，放大身段，于万物始终处看待自我生命，方能于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处，看透生命的本质；而于此处看破，穷理尽性至于命，才能不于区区百年执生死，将身子放于天地间，与宇宙万物一起生化流行，求得永恒绝对的价值；而以大道至德之心与宇宙法则为一，与天地精神相契合，则可以使卑琐渺小的世俗生命，变为昂首云天的宇宙伟大生命矣！尧夫讲“我性即天天即我”；象山讲“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白沙子讲“天地无穷年，无穷吾亦在”；以及刘戡山先生讲“天地万物之始，即吾之始；天地万物之终，即吾之终”，就是讲人之宇宙伟大生命及自我永恒绝对价值的存在。此人之涵养扩充得道德本性，达于性命之情，而得以成长与自我拯救者也；亦涵养扩充心性，若火之燃，泉之达，虚而灵，知而觉，化腐朽而为神奇者也。如此看待道德，何来“吃人”之说！只有将道德仅仅看成是强制性的外在规范，那它才是束缚人、奴役人、桎梏人，甚至是“吃人”的。

那么，什么是中国文化所说的道德呢？它源于何处？源于经济关系、社会事物吗？那是利害冲突的所在。道德源于经济关系、社会事物，只能带来利害之争，功利之求，而不能产生任何道德情操，更不能建立起高尚道德的精神世界。道德来源于物的知识吗？物于物而不能超越，从知觉对象或感官材料所获得的知识，只是形名知识，只是物的小知小识，而不是涵养情操、扩充心性的道德。以小知小识而器器于天者，大有人在，但它不能大德内充，无所不适，忘怀应物，无所不通。现在，人们只晓得“知识就是力量”，而不懂得知识也是争斗的工具。小知小识，不但不能涵养情操，扩充心性，反而会遮蔽人生，流荡道德。故庄子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形名的知识，物的小知小识，非知天知人，大齐于万境，与造化同功德者也。

道德来源于何处的问题，从哲学上讲，乃是道德以何者为源头，以何者为本体论存在的问题。大凡世界古老文明民族的道德，都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他们的文化形而上学存在。他们的道德，大多是从其文化形而上学存在引申出来的，如印度文化的道德来源于神圣的“梵天”，西方文化的道德来源于“逻格斯”或上帝存在。中国古代文化，虽然也有“惟皇上帝”、“皇矣上帝”的神圣本体存在，但由于中国文化的早熟，隐退了上帝，以天道或形上大道本体代之，也就建立起了区别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形而上学存在，即“道”的形上本体存在。这个“道”，实乃中国古代民族对宇宙

法则秩序的纯粹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而对“道”的体验与领悟，得之谓德，宜之谓义，其知觉思维形式与价值思维肯定形式，就是道德。此即王弼所说“德者，得也。德由乎道”者也。正因为道德来源于对“道”的体验与领悟，来源于对“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之天道法则秩序的道德体验与领悟，所以世界有多美好，道德就有多美好，也许比世界本身更美好。它不仅包含着华夏民族“穷神知化”所获得的最高知识，而且包含着他们存神入化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世界、善的世界、庄严神圣的世界与纯纯不已的世界，包含着他们由此获得的全部人生价值与意义。中国文化的道德与精神世界，全部本于“天道”或大道本体形而上学存在，是由此形上本体的实有是理、真实无妄存在获得的。它从宇宙本体论上讲，谓之道体形而上学；而从道德本原上讲，则谓之道德形而上学。此即我所谓“道德本体论”者。它首先是在宇宙本体真相上讲的。因其是在对宇宙本体真相——道或大道的体验领悟上讲的，故称之为道德形而上学。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道或大道本体，虽然是实有是理、真实无妄的存在，但它作为宇宙万物法则秩序的纯粹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是离不开人，离不开人心人性，离不开人的主体性存在的。惟有这个灵明心性存在，这个天渊灵根的存在，才能思考宇宙万物的法则秩序，才能对它做出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才能创造种种道德精神世界。因此我在《心性灵明论》自序中所说的“一切范畴概念，一切理论方法，一切原理、定理、定律，一切事实的归纳，一切理论的设定，一切经验的实证，一切逻辑的运演，一切观念理念的提出，一切法则秩序的肯定，一切信仰信念的建立，一切主义与世界观，一切见解与皇皇大论，以及种种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包括神天神帝、丈六金身、庄严色相、天堂地狱”等等，无不是人创造的，无不是人凭着灵明心性，凭着这个价值本原创造的。没有这个价值本原，没有这个天渊灵根，这个灵明存在，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这诚如王阳明先生说的：“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外部世界没有我的灵明，也只是茫茫荡荡、浑然一片的存在，离开人的存在，谁去对它进行价值思维肯定与抽象？谁对它进行纯粹道德精神思考？哲学是人的精神活动，它必须回归到人自身，回归到它的出发点，回归到一切知识、意识、精神创造活动的主体性存在。没有人，没有人的主体性存在及其创造活动，便没有知识，没有意识，没有哲学，没有范畴概念，没有道德形而上学。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华民族，苟无至德、至道何以凝焉？若无形而上学的智慧，何以能获得“微妙玄通，深不可

4 道德本体论

识”之道？获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的存在？中华民族，正是凭着虚灵不昧之心，会通大道，洞彻天理，获得天道至德，获得精神世界的。这个世界，不仅是他们良知明觉，炯炯光明，胸次洞彻浩然的存在，更是他们凭着湛然虚明之心，超然象外，知至至之，知终终之，穷神知化，获得的最高智慧，包括他们的信仰、信念、道德、理想与性命之理在内。礼义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讲法相，讲宇宙万物本体真相，未有不透彻心性本体大用而为万法本原者也。因此，我所谓的“道德本体论”，更是在人心性本体存在上讲的；而其为道德，最终是以人的心性本体存在为其源头的。

但是道德，特别是道德精神，并不是躯壳上起意，不是欲念纷飞，妄意纵横，而是人性美好的表现。中国文化哲学之谓的心性，不是指血肉之心，生物本能之性，而是在“天命之谓性”，“继之者善，成之者性”上讲的，在人的仁义礼智之心，“好是懿德”的先天道德本性上讲的。此乃人的本质规定性，亦人与动物本质不同的“几希”存在。因此，本书所讲的心性本体，不是指人的形气知觉与动物本能，而是指人天理昭明的知觉存在。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而人之心性，扩充至极，尽其心，知其性，则知天也。朱子讲“性之本体，理而已矣”；王阳明讲“心之本体，即是天理”，皆是指心性与天理、天道本体与心性本体统一性而言的。而道德形而上学，就是天理昭昭的灵明知觉存在。这里，虽离心而无道德形而上学，但道德形而上学亦不是纯粹主观，而是推本于天，反诚于性，知觉昭明天理者。它在宇宙本体真相上讲，谓之道体形而上学；而在天理良知上讲，就是心性本体存在。而道德形而上学，乃以道德而统一大道本体与心性本体者也。这与佛教以心识统一性、相二宗是非常不同的。佛教讲一心真如，即是心性宗；而讲法相生灭，即是法相宗。但真如与生灭非二门也，离有无二边而为圆满真实存在，皆本于心识也。故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此乃是离天理而以心起灭万象者也，非推本于天，反诚于性，知觉昭明天理之心性本体及其大用者也。

而在中国文化看来，惟此心性本体存在，惟此天理良知者，才能于宇宙浩浩大化建立起知觉主宰处，获得性命之理，获得大道本体的大美、崇高、真理、正义、庄严与神圣存在，创造出各种美好的道德精神世界；而道体流行，见诸人伦日用，才能以纯乎天理之心，亲其亲，长其长，诚于孝亲，和气、愉色、婉容，而有德色。这种纯乎天理、创化不已的心性存在，就是本部论著所说的道德本体；而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华夏民族道德精神世界的

获得，就是本部著作所谓“道德本体论”研究。本部论著，意在研究道德本体与整个道德精神世界发展之关系，故副题标明“关于道德形而上学与精神世界的研究”。全书共十章，前五章讲道德形而上学性质及其道德获得、良知之致与绝对精神发展，后五章讲道德形而上学及道德精神之大用，特别讲了至诚不息的信仰信念与精神世界自由问题。本部论著所讲，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体用同源，显微无间，以道德形而上学为根本，国家民族道德精神的重建为使命，极力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自诚自明，择善而固执之，以期不辱使命，经两年有余而完成。整部论著，虽略显冗长，难以尽善尽美，然若就中国道德形而上学及其精神大用而言，该讲的问题，基本上都讲到了。然由于该本论著涉及领域极为广阔，内容也极为复杂，除了前两章总论道德形而上学的性质与其历史发展，及最后两章讲道德修养与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理论上尚好理解外，中间几章及所涉及的问题，读者还是比较生疏的。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把握，在这里简要地给予说明与解释是必要的。

道德是怎样获得的？它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反映论问题，不是浅薄知识论问题，而是德性之知的存在，是万感万应获得性命之理与人生意义问题。天地之间，凡一切阴阳、动静、感知、应对、食息、出处、去就，皆有感应。故感应是普遍存在的。惟此，程子才讲：“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感与应而已。”人生于世，凡有所动，则有所感；而有所感，则必有所应，感而应，应而感，感应不已，以至无穷。天下之动，一念应之，出入往来，相激相荡，一旦陷入非理性而不能止，则吉凶悔吝生矣。因此，中华民族从古代时候起，便极为重视感应问题：不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而且整个国家民族无不从感应中获得性命之理与人生意义；特别是天人之间的感应，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道德精神世界的发展及其信仰信念的建立，皆是与这种感应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它最初存在着神秘主义，但研究道德感应原理及其精神哲学性质，仍是通晓中华民族道德感获得与精神世界建立的根本途径。这就是我于本书所以专章“论道德感应”的原因所在。

不论是圣人之教，还是百姓之习，在中国文化中，做人要有良知，是非常重要的。若良知不存，还做什么人？何谓良知？良知，即知之良者，即知做人的那点根本道理。良知即良心，即好心，即一个没有被伤害、蒙蔽、腐蚀的心。因此，我所说的良知，不是在一般知性上讲的，而是在做人的道理上讲的。若从现代哲学上看，良知属于伦理道德意识形态范畴，属于仁义礼智的知觉形式，而不是由感官材料所获得的知识；但是，它也不是仅仅指不

思不虑的先天道德知性，而是指意识到的道德知觉形式，用王阳明的话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而非虚灵知觉。正因为它属于道德知觉形式，属于道德意识范畴，故我称之为“道德良知”。研究良知的先验本体论性质，及它是如何成为意识到的道德本体存在的，不论是对于道德意识疏辨，还是重建整个社会道德本体，唤起人的良知，都是必要的。这就是我于本书所以专章“论道德良知”者也。

天地之间，惟心是虚灵不昧。它不仅可出入造化，终始古今，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且其为心体，乃是纯粹至善的存在；而其他存在，如情性、意见、思想、才情等，皆不过是心体的派生物，离开心之本体，皆不过是躯壳上起意而已。人的一生，岂能只是从躯壳上起意，枝节上做人，岂能不立于天地间，迥然做个品位高尚者？现代人所以浅薄，所以看人生不通透，所以只会操弄那点见闻知识，只会算计眼前那点自私利益，而不能立于天地间，达于性命之理，除了内心没有深厚博大的道德精神世界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代缺少一种绝对精神。现在，整个哲学陷入了相对主义。它只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而不可能建立起“万物一理”的世界观，也不可能培育起“语默动静”，皆“贞夫一”的道德精神境界。如此之人生，如何能不躯壳上起意，流于浅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相对主义，而没有绝对精神，那是非常危险的。因此，研究中国文化的绝对精神及人生存在，就构成了本部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部论著于六、七、八章，分别讲至诚不息、人心主宰与无待的自由，内容看起来似乎有点矛盾，其实，它恰恰表现了中国文化哲学内在的统一性。中华民族是一个以聪明睿智达于天德而至诚不息的民族。他们的信仰信念，不是来自“上帝”的价值设定，而是来自刚健中天的天道法则，来自天道法则的真实无妄之理。故曰“大哉乾元，诚者之源”；故曰“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有此刚健中天的法则，有此无妄之理，而主宰于心，才能诚明不息，建立盛德富有的伟大事业。而这种主宰，不是外在的，而是人的自我主宰。中国文化的形上之“道”或大道本体，不是西方文化的“上帝”或神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它是不做主宰的。故老子讲：“大道汜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它不但不做主宰人，不奴役人，不统治人，而且获得它，至德内充，与物冥而循大变，能无待而常通，无时不适，无往不通，还可以给人以无限的自由。这种自由，乃是一种“物物而不物于物，逍遥不我待；玄感不为，不疾而速，逍遥靡不适”的自由，一种精神的自由，灵魂的自由，一种无待而常通的，非逻辑、非因果关系的